

比较文学文库

曹顺庆 王向远 主编

[德]  
胡戈·狄泽林克◎著  
方维规◎译



*Bi Jiao Wen Xue Dao Lun*

# 比较文学导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0-03

35

比较文学文库

# 比较文学导论

*Bi Jiao Wen Xue Dao Lun*



[德] 胡戈·狄泽林克◎著

方维规◎译



I0-03/35

200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导论 / (德) 狄泽林克著; 方维规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 (2010.4 重印)  
(比较文学文库)  
ISBN 978-7-303-10445-1

I. 比… II. ①狄…②方… III. 比较文学-高等学  
校-教材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8720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0.2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马佩林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 淡晓晖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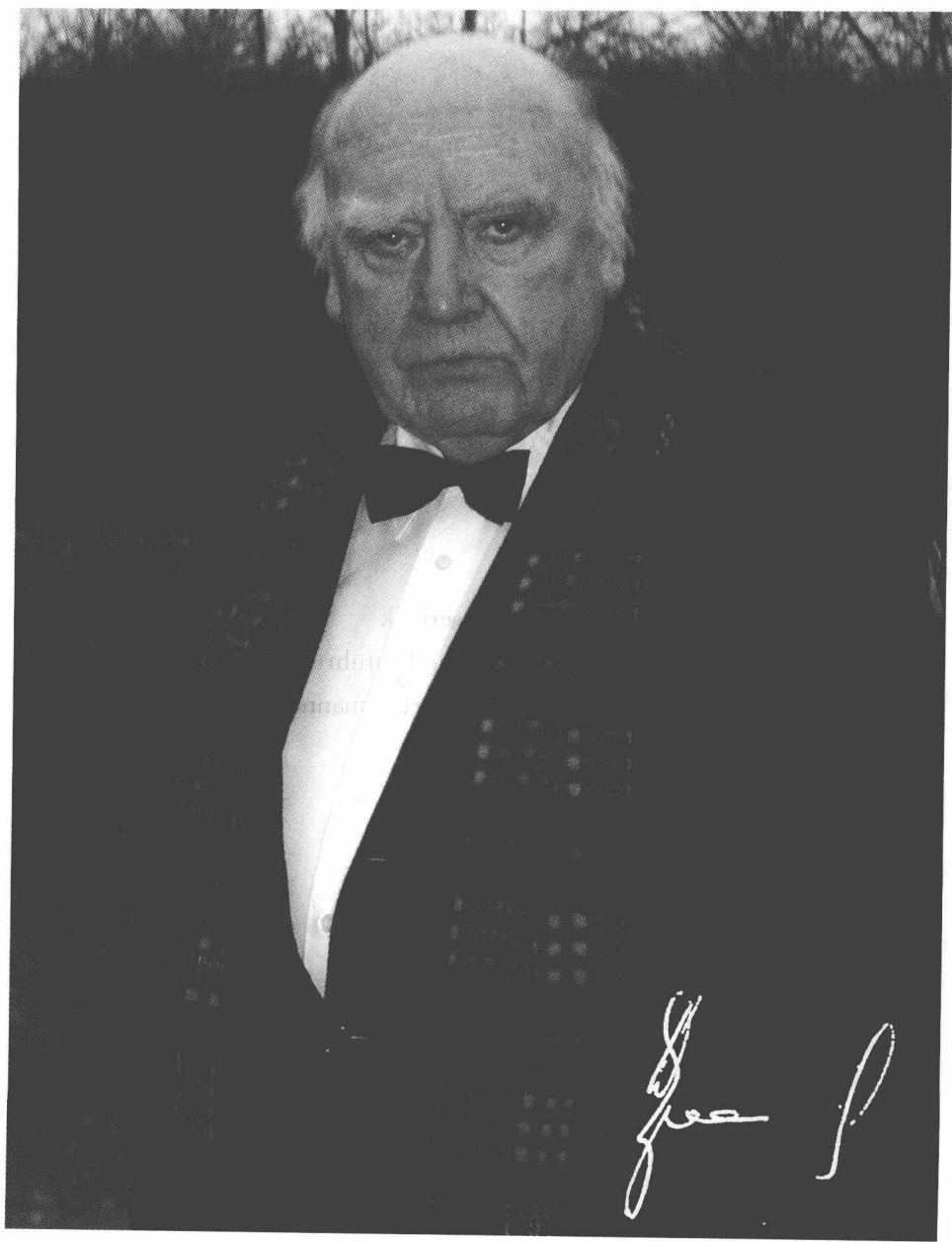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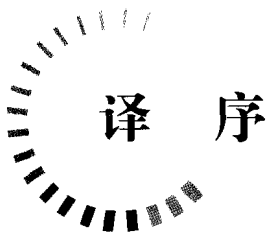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质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胡戈·狄泽林克

Hugo Dyserinck  
Komparatistik; Eine Einführung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77) 1991



## 译 序

这本《比较文学导论》初版于1977年，第二版修订本出版于1981年，1991年出第三版。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15年里，国际比较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初版到今天，本学科更是今非昔比。尽管如此，该著作对比较文学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本书对比较文学基本问题的阐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完全失去其现实意义。第三版对第二版的正文未做改动，作者当时认为，“本书对比较文学原则性问题的阐述，其根本观点还没有修改的必要，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亦无须做重大修改”。当然，我们今天只能视之为作者18年前的观点。

在当今西方，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家不懂三四种语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本书作者胡戈·狄泽林克便精通多种语言。本书用德语写成，但是书中的大量引文均为原文，涉及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狄泽林克是西方著名比较文学家，也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离休之前任德国亚琛大学哲学院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如今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可是我们在一些比较文学国际会议上还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比较文学专业同许多其他专业一样，没有真正的教科书可言，而这本《比较文学导论》开初就是作为大学“教科书”和专业读本而发凡起例的。当初，德国的一些州曾经规划在文科高中推广比较文学，这本《导论》同时也是作为培训高中教师的专业教材而编写的。在文科高中推广比较文学的计划最后没有如愿以偿，然而本书确实成了德国许多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教科书”之一，已被译

成多种语言。

一个文学批评家或文学史家，他的著作在 50 年或 100 年后仍然能够吸引后来的学人，并对之进行研究，实在是不多见的。比较文学家的命运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在人文科学里，一部著作在 30 年或半个世纪以后，不被看做陈旧或可笑，充满时代的局限或派系的成见，就已经很难得了。另一方面，一部真正具有学术含量的著作，即便在 30 年、50 年之后，读者依然能够从中看到真知灼见，甚至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比较文学导论》可能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有些说法过时了，有些内容光彩依旧。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的思路，对相关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鉴于比较文学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德语国家）发展中的坎坷历史，作者在本书“绪论”中着重评述了比较文学专业同国别文学专业的矛盾关系，作者认为二者的对立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这种矛盾关系完全可能是世界性的”。至少在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狄氏的担忧并不是无中生有。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或曰正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家与国别文学专家之间的龃龉是很常见的：对一些比较文学家来说，国别文学专家的视野太狭窄，而后者则视前者为半瓶子醋。不仅如此，同欧洲许多国别文学研究相比，“年轻的”比较文学曾在不少地方受到排挤。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狄氏不少论述的“火药味”和论战性。作者竭力维护比较文学权利的一些文字，在我们今天看来恍如隔世。但是曾几何时，比较文学必须抗争，这并不是很遥远的故事。而且，比较文学家与国别文学家之间的“文人相轻”，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这或许是中国学者无法想象的，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之间并不是矛盾重重，更谈不上冲突。

在这个上下文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本译作中的“国别文学”概念的翻译问题，其原文为 *Littérature Nationale*（法）、*National Literature*（英）和 *Nationalliteratur*（德）等。迄今的中文翻译中，*National Literature* 基本上译为“民族文学”，例如在谈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时候所涉及的“民族文学”概念，或如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译作

第五章中的“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这里存在对西方近代以来“Nation”概念的理解问题：一般以“国家”解，在一些具体或特殊的情况下以“民族”或“国民”解；而 National Literature 中的形容词“National”基本上是指“国家的”，间或也有“民族的”意思。一般而论，汉译西文至今存在如何把握“Nation”亦即“National”的问题，常把“国家问题”译作“民族问题”，“国别文学”译作“民族文学”。不可否认，即便在本书中，“国别文学”在个别地方完全可以理解为“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也不完全排除“民族文学”，但是这里涉及的两个翻译概念毕竟是不对等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多种“民族文学”。而在大多数语境中，“国别文学”的译法更为妥当。另外，本书中常出现“单一文学”概念，基本上可以视为“国别文学”的同义概念，只是为了区别于多种其他（国别）文学。

狄泽林克分析了比较文学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借此阐释了比较文学的目的、功能、方法和选材等一系列问题。作者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国界的，“它的研究课题从文学影响和作用的一般研究，到历史形成的国别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及至综合考察方法，把各种语言文学各自为政的研究门类组合成新的整体”。比较文学只有作为独立的特殊学科（既不是辅助学科，也不是超级学科），才能解释世界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解释这些现象，是因为它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运用一种由不同的文学组成的多国整体之特殊性质所决定的范畴系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更多地是从多国多语种的材料中进行超国界选择而取得的”。

加雷在为基亚的《比较文学》1951年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狄泽林克一方面认为加雷过甚其词，因为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不是加雷所说的那种情形，即“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什么地方将随便什么东西进行比较”。但是另一方面，作者重提加雷旧说，显然是为了再次告诫人们，不要以为比较文学可以不顾特定的历史状况，随心所欲地将随便哪些作家做海阔天空的比较，或者以为比较文学的头等大事就是文学的比较。

上编“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中，作者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比



较文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介绍了对比较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事件和主要理论著作，并在介绍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评论，以此阐明自己的比较文学观。本书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注重从历史的发展中阐述问题，在历史中发现新问题，这在上编中尤为突出。文中对比较文学代表人物既征引又评介，问题讲得比较透彻。而且，不但有正面观点，也有反面看法，从而有助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或引发新的思考。也正是这第一大特点，最能见出该著的科学史意义和价值。

作者首先系统地介绍了比较文学“从起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尤其是法国的成功经验和德国发展中的挫折。与国别文学研究齐头并进的、独立的比较文学之发端，只有到19世纪下半叶才谈得上；尤其是奥匈帝国的日耳曼文学史家梅茨创办《比较文学杂志》以后，这门超国界的独立学科才较为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本杂志的要义是承认国别文学的存在，并从超国界的立场出发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这也是以后所有比较文学的准则。1887年，德国人科赫创办《比较文学史杂志》，强调比较文学应当为更好地认识本国文学服务。对于这种研究宗旨，本书作者始终持否定态度。总的说来，起初的新的研究方向没能得到真正推广。唯独在法国的发展较为顺利，比较文学最先在那里成为大学的独立专业，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惟其如此，人们常把法国视为比较文学的摇篮。巴尔登斯贝格强调了比较文学的独立性、关系研究和文学接受等问题；阿扎尔和梵·第根则进一步标举超国界意识，后者还提出了“总体文学”的主张。与之颉颃的是德国的反比较文学倾向：一些学者要么以为比较文学并无新招，要么主张用比较文学为国别文学服务。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发轫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早期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的桑克谛思、格拉夫、法利奈里，瑞士的贝茨，丹麦的勃兰兑斯，英国的阿诺德、圣茨伯里、波斯奈特等人。另外，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和美国也对比较文学产生了兴趣。值得一提的是，贝茨提出的比较文学主张，几乎就是后来的法国学派的雏形；而他的反对者威茨的观点，也十分相似地体现于后来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判之中。

本书上编中十分重要的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论述，梳理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各自不同的历史渊源，及其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从中见出两派对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又不无偏颇。法国学派不把阐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看做比较文学的首要任务，注重探讨不同国别文学的作家之间“确实存在”的关系：“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的精神联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加雷语）美国学者韦勒克于1953年发表《比较文学概念》一文，引起了法美两派之争；他又于1958年发表《比较文学的危机》，该文被视为“美国学派”的基石。韦勒克指责法国学派既狭窄（局限于“事实联系”亦即关系研究）、又宽泛（最终会走上同文学研究毫不相干的歧途）。他反对只注重关系研究，提倡旨在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注重“文学性”：“假如非要保留‘比较文学’这一术语，那它只仅仅指文学研究，而且不受语言差别的约束。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才有前途。”

应该说，狄泽林克对法美两派的述评是妥帖而客观的。美国学派的功绩在于，“彻底地发展了一种真正的超国界立场”，摆脱了国别文学研究的制约。但是，它过分否定语言界线和国别界线的功能。法国学派的长处是“超出了审美范畴而又不把它排除在外”，其缺欠则是韦勒克所指出的现象，即把研究局限于“事实联系”。这些分析对我们今天的考察依然具有借鉴作用。一个流派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有合理因素，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因此，全盘否定或彻底接受一种模式，或者偏褒一方贬斥另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学界不少人也许由于对奢谈社会政治的厌倦，也许出于一种新鲜感而过分倾向于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矫枉过正的事例。狄氏认为“建设性地利用两个学派的区别，这才是合适的”。

上编最后论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及其问题”。本书中的所谓“现状”，自然只是本学科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因此，不少“现状”已经过时，更何况在这之后，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文

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中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尽管如此，狄氏所阐释的一些现象在学科史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例如法国人艾金伯勒提出的“（真正的）总体文学”模式。作者虽然对这位巴黎比较文学家的总体设想的可行性提出异议，说其带有幻想色彩，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纲领或许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把握全世界（包括亚洲和非洲的）广博的文学创作。

在我们看来，倡导“（真正的）总体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欧美中心主义，让人们放眼世界。同时，要涉猎国际文学，就必须要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这一伟大的工程。就这点而论，艾金伯勒的比较文学构思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同样是在欧洲范围内，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具有特殊地位，它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分析中的职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欧学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比较文学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另外，国际交流给中国比较文学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中西文学亦即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文化的比较中发挥自己的专长，使自己成为本学科的“后起之秀”。

狄泽林克一再强调指出，比较文学既不是“超级学科”，也不是“辅助学科”，更不是“过渡现象”。鉴于克劳斯等人依然认为比较文学要为国别文学服务，姚斯把比较文学看做“歪门邪道”，作者认为比较文学面临的急迫任务之一，就是诠释和统一学科名称。关于术语或比较文学名称问题，作者做了大量论述，并赞同法国人约内的提议，用 *Comparatisme*（德语：*Komparatistik*）作为“比较文学”（包括“总体文学”）的统一名称，而且接受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给这一学科所下的定义：“‘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专指超越某种国别文学界线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为了避免对比较文学的误解，作者介绍了威斯坦因所代表的美国模式的三分法，将比较文学分为比较文学史、比较批评和比较理论三个部分。最后，作者概括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一、多国文学关系研究；二、特定时期内不同文学的异同研究；三、文学理论研究；四、方法学研究。

下编“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及其发展前景”中所谈论的问题，不但是以往比较文学中的焦点问题，也是晚近比较文学真正的核心领域，

如主题学、形象学、方法学以及文学关系研究等。如果说上编体现了该著作特别注重借助历史发展阐述问题的一大特点，那么，下编则集中体现了本书的第二大特点——综合性。作者在综合中阐释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

在第一章“比较文学史及其相关领域”中，狄泽林克首先就比较文学必定要涉及的国别文学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国别文学”的划分，作者认为语言界线是第一性的：“单一文学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区内，用所属文化语言写成的作品的统一体。”其次，政治界线也是划分“国别文学”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对比较文学具有决定性意义。作者认为，只有既超越了语言界线，又有明确的超国界立场，比较文学才真正开始。读者一定会发现，“多国研究材料”和“超国界立场”是狄氏比较文学观中的核心问题，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可谓不厌其烦、不失时机，甚至到了烦琐而累赘的地步。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比较什么和怎样比较的问题，甚至什么才能被看做比较文学的问题。像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以及他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那样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只有多国研究材料和超国界立场才是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超国界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对象和材料的跨国性，并不自然而然地代表了一种超国界意识；这里说的是国际主义意义上的超国界意识。总有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他们认为比较文学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本国文学。这无疑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诚然，对外国文学的了解以及一些研究方法得以使人开阔眼界，能够更好地认识甚或重新认识本国某个作家、某代作家或某个文学时期，为本国的文学研究服务。然而，这是国别文学学者的事情。比较文学家则应当从超国界立场出发进行跨国研究，他要获得的是对“文学”的一般认识。即便是个案研究，或者时常见到的影响研究，最终也是为了通过勾勒史实，发现国际文学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现象或者所谓“规律”。而平行研究不能因为“民族利益”而对不同文学有所偏颇，主要不是为了得出“我们古已有之”之类的结论。换言之，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突出本国文学：我们也有，而且更好！当然，对不同文学和作家的公允评价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就像比较文学家充分利用国别文学专

家的研究成果一样，国别文学专家何尝不可充分利用比较文学家的研究成果？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对于这些问题，狄泽林克做了精当的论述。

在比较文学中，文学关系研究统治了数十年之久。狄氏在肯定关系研究的同时，指出影响研究在关系研究中的垄断地位是一种“畸形发展”。因此，他要求重新评价那些研究作品异同的“平行研究”，即是说：“一方面对传播和接受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突出异同研究；二者结合在一起，比较文学关系研究才真正是可行的。这样便得以揭示不同的‘民族’模式（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包括整个精神生活）怎样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相互呈现、相互作用。”

狄泽林克反对韦勒克关于形象学不属于文学研究范畴的观点，并用世界文学中的事例说明“形象”与有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人们不注重形象研究，甚或无法理解特定文学作品，更谈不上全面阐释。形象学研究各种文学形象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中所产生的影响。在此，作者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比较文学除了审美功能外，还要对各国人们的相互理解做出贡献，“这根本不是文学研究的耻辱”。

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翻译”为题，作者探讨了翻译文学，并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分为“大范围”和“小范围”，前者考察哪些作品被人翻译等问题，后者分析如何翻译等问题。作者联系“形象学”，推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和接受的关系；他又联系“语言内涵研究”，分析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作者认为，译作对原作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偏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译者的水平和其他一些原因以外，对原文的偏离在许多情况下还在于“语言结构本身制约了他，他无法突破语言的樊篱”。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分析了梵·第根所发展的“总体文学”模式的得失，并用基亚的观点对之做出评价，称“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最高形式”。它平允看待不同国别文学的特点，既突出差异又注重类同，这种比较方法有利于从根本上排除跨国研究中的误解。

全书最后一章“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总体文学”，探讨了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以及比较理论和方法学问题。作者认为，要获得总体文学知识，就不得不进行比较。总体文学一开始就属于比较文学：“只有

超国界进行的文学研究才能回答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一理论问题（例如‘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只有超国界进行的文学研究才能系统地、历史地把握和分析各种不同的方法。”作者不赞成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探讨”和“内部研究”并强调后者的“优先权”，也就是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狄氏同样看重“外部探讨”，比如“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最后，作者阐述了文学理论与方法学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们对“总体文学”的认识一向很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文学理论与方法学缺乏明确的区分，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也是如此。狄氏则对二者做出了划分：探讨文学与社会、宗教、思想史的关系，或者探讨文学作品本体论方面的问题，以及“灵感”或“审美冲动”等，均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或解释文学作品时，是否运用或怎样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或艺术史等学科的特定方法，便是方法学的问题。在“结语”中，作者又归纳性地重申了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该著除了已经说过的两大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材料丰富，且纵横交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狄泽林克原来是罗曼语文学史家，因此对法国的比较文学史料驾轻就熟，对法国学派的点评尤为精到。当然，作者对于其他各家学说，均在认真梳理的基础上评长论短，以使读者对某些问题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本书在理论上自成体系，颇有特色。各章既是独立的单元，又因其内容和结构而有机地从属于整体。

西方著名比较文学家和学者对狄泽林克的这部《比较文学导论》颇多推许。瓦尔特·瑙曼认为该书“使读者懂得了比较文学的独特性，这不是类似的一些导论都能做到的”。曼弗雷德·克施泰格认为：“对德国比较文学的自我认识来说，狄泽林克的著作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雅克·穆尼埃则说：“狄泽林克的著作表述明晰，颇有见地，堪称比较文学工作者的挚友，书中的许多卓见颇令人深思。”

当然，这部《导论》终究只是一家之说。不少论述只能代表西方学者的观点，尤其在强调比较文学欧洲属性的时候，东方文学完全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本书带有欧美文学理论的一个通病，即对东方民族的文

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文学作品，几乎全无论述和引证，这与作者对东方文学缺乏了解有关。另外，这本欧洲意识极强的书中不时流露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甚或欧洲中心主义。这一拘囿的原因之一，狄泽林克认为欧洲“差异中的统一”特别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一定要为狄氏辩护的话，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化整体’的文学的时候，思考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全球性实用意义。”“西方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类型的精神实验室。”诚然，欧洲中心主义是必须拒绝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该书对西方比较文学的历史阐释以及不少独到见解，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译录了《导论》第三版附录“比较文学理论文章、书籍编年索引”，以介绍一些“最重要”的论文和书籍，“其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了解本专业自诞生以来的基本问题的发展概貌”（狄泽林克语）。这一“索引”的缺憾依然是缺少东方的比较文学文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新近出版的一些同类书籍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例如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2002），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2006）。如前所述，艾金伯勒所说的“（真正的）总体文学”，本来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这一工程。

本书下编第一章第四节“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译文，已经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鉴于狄泽林克在当今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国际地位，下面我们结合狄氏的思想，简要论述一下形象学问题：

狄泽林克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和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韦勒克1958年的名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加雷和基亚的批判，暂时葬送了形象研究的发展，那正是“新批评”得势的时候。韦勒克及其追随者对法国研究方向的批判，将形象研究打入冷宫。直到1966年才出现第一篇有力的回应文章，即狄泽林克的《关于“形象”与“幻象”及其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译文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这篇短文是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的反思，亦可视为“新生”的形象学的开山之作。狄氏强调了形象的研究对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并非韦勒克所说的无关紧要。关于“形象”和“幻象”，狄泽林克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著中，

我们还能不断遇到某些‘形象’和‘幻象’，它们似乎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文学作品的所谓典型特征，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偏见和虚妄之语的产物。”在这部《比较文学导论》中，狄氏保留了前说。但是，狄氏在他以后的论文中，彻底抛弃了“幻象”之说。所谓“幻象”（也就是不符合实际的形象），常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它亦有其生成和发展的时代及思想背景。批驳“幻象”以确立“正确”形象，只会让我们重回老路，陷入虚假意识的恶性循环。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说，谁能提供“这样的”国家本质特征和“这样的”民族性格特征呢？“形象”的正确与否并不是形象学用心根究的问题，形象研究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象”，也就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比较文学形象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重新定位或曰真正突破，无疑得感谢狄泽林克，Imagologie（形象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名称也是他最先引入比较文学的，他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氏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形象研究，以及他所代表的亚琛比较文学纲领对形象学的重视，不管在理论阐述方面还是研究实例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狄氏重新倡导形象学之后，谁也绕不开他，即使是新的发展和新的视野，也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反应。《比较文学导论》一版再版，在这期间，形象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蔚然成风。

本书所论“比较文学形象学”，毕竟初版于 1977 年，作者本人在八九十年代的论述中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从而使形象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比较文学形象学”产生于这个研究领域被奚落被冷落的时期，因此，狄泽林克在文章中为发展这一研究方向“摇旗呐喊”，有些陈述和论点因为新的发展已经过时，还有一些想法未必高明。尽管如此，本篇中的基本或主要观点以及狄氏后来的一些论述，依然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另外，本文中提出的某些设想，也已经成为现实。另有一些观点，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形象学”，我们对在狄氏此文及以后的论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迄今的基本认识做一个大概勾勒：“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者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



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德语：Bild，俄语：obraz）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group）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也就是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所说的具有“符号功能”的形象。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他者与自我“群体标记”是一种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自我与他人的划分形成了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对照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相反，自我形象则主要是作为他者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往往是程式化的。“形象体”（imagotype, image）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化约，是人云亦云、习以为常的固定认知形态，也就是体现于语言文字的“俗套”（法语和英语：cliché，德语：Klischee，法语：stéréotype，英语：stereotype，德语：Stereotyp）。俗套“他者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形象学则试图揭示文学或文化交流中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并为批判固定观念形态做出贡献。

中国学界，尤其是比较文学界在论述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的专论中，一般谈论的是“他者”或“异国”形象，几乎不见明确的有关“自我形象”的论述。应当说，只论“他者形象”、不谈“自我形象”的形象学导论，多少给人跛脚之感，因为“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是形象学的两个相辅而行、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美国文人的美国形象、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形象学的应有之题。我不否认中国的形象学论述中亦可见到诸如“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述，或曰“本土”与“异域”关系的或明或暗的自觉意识。但是，就学术规范而言，“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是应该明确区分的。